

何春蕤

〈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〉

作為一個「離開眷村而又想念眷村的女孩兒」，朱天心試圖以記憶中眷村生活的點點滴滴，在「各自求生」的人群中召喚出眷村的弟兄（姐妹）們來共同建構其以族群為本的共同記憶。

朱天心或許相信眷村人口那種「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迫促之感」形成了他們驛動的心，使得他們缺少了本省男孩的「篤定怡然」，但是眷村的生命史也同時是台灣社會的變遷史，這個變遷的衝擊也同樣造成了無數離鄉背井到都市謀生的年輕人口，在在可見的台語「出外人」歌曲正記載了相似的危機迫促感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朱天心所感受到本省男孩的篤定怡然與其說是族群差異的表徵，倒不如說是她出於性別立場考量婚姻前途，而對某些（本省）男孩的階級成分所做的投射。

由這個女性的角度來看，朱天心耿耿難忘的（眷村）女孩典型「小玲」便成了故事中觸目驚心的一個標竿。她是個叫不出全名的平凡女子，胸中埋著不明所以然但絕不與人分享的性秘密，默默地行走人生。這個女孩事

實上不是外省人，也不是本省人，而是處處可見的性別政治下的產品。朱天心在小說結尾點名叫出眷村子弟時，最令人難忘的却是這個橫跨族群分界、突顯性別身分的小玲。

強勢主流論述的翅膀掃過許多作家，使她們的作品也呈現出與主流相似的關懷，好在她們並不都全面屈服配合，發人深省的作品還是會（自覺或不自覺的）向主流論述揚起驅魔的法索的（典出《大法師第二集》）。

後記：另一種陳述本文論點的方式，可以參考本期《島嶼邊緣》的〈假台灣人：台灣的第五大族群〉一文之註六。我想一旦我們仔細考察族群的建構策略與過程，就可以發現「族群」必然依賴著「階級」、「性別」等其他範疇。

所謂「某族群的特殊經驗、特殊歷史、特殊心理、特殊文化……」等等，在考察其建構過程時，便會發現其實也並不那麼特殊，並不足以真的構成什麼「族群的本質」。外省或本省族群之建構均依賴了共同的階級／性別……經驗或文化。（族群的社會建構就像階級／性別等之社會建構一樣）。



朱天心在省籍問題上拒絕媚俗，但在省籍內的階級、性別問題上卻可能流俗